

(吳宓研究)

吳宓主編《學衡》雜誌的初步考察

王泉根

《學衡》雜誌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份標榜“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匯新知”，以文史哲學術論文為主体，並兼有文學創作與翻譯的綜合性文化研究期刊。由於各種原因，有關該刊的辦刊始末與整體面貌等一直缺乏詳盡的考察文字，留下某種遺憾。本文依據考查所得，擬就此問題作一客觀持平的述評，期以引起文化研究界的注意，並就教於廣大讀者。

第一部分 《學衡》始末

一、《學衡》的出版發行情況

《學衡》雜誌於1922年1月1日在南京東南大學創刊，1933年7月終刊，共出79期。其中：1922年1月至1926年12月為月刊，計出第1~60期，共60期。1927年因北伐戰事停刊一年。1928年1月至1929年12月改為雙月刊，計出第61~72期，共12期。1930年因總編輯吳宓赴歐遊學再度停刊一年。1931年以後出版甚不正常，時斷時續。1931年1月至3月計出第73~75期，共3期。1932年5月、12月出刊第76~77期，共2期。1933年5月、7月出刊第78~79期，共2期。此外，1926年3月曾再版發行第1~50期，1931年又再版第51~70期。

《學衡》雜誌為16開本，每期正文120頁，另有4頁套色插圖。自第14期（1923.2）起，各期均附有本期主要文章的英文目錄及英文《學衡》簡章。該刊自創刊至終刊，所載文章均無稿酬。編輯兼發行者是南京《學衡》雜誌社，出版印刷及總發行者是上海中華書局。該刊向國內外發行，第60期（1926.12）曾刊登過一則啟事，說明“國內及日本，每期三角，全年（六期）一元五角。歐美各國，每期四角，全年（六期）二元。”

二、《學衡》雜誌編輯力量

《學衡》雜誌的編輯力量主要是南京東南大學的一些文史哲教授。據台灣學者羅佩秋《柳翼謀先生及其學衡諸友》一文稱，柳詒徵、劉伯明、梅光迪、湯用彤、吳宓、胡先驌等人皆為《學衡》的創辦人，而柳、吳二人致力尤多。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江蘇鎮江人，歷史學家、圖書館學家。清宣統元年（1909）優貢，1916至1925年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後長期任大學教授及圖書館館長。《學衡》創刊號卷首“弁言”即出自柳氏手筆，自1924年起，任《學衡》南京編務處的幹事。柳氏在《學衡》雜誌發表文章位居第一。其中，第46~72期，連載68章45萬字的專著《中國文化史》影響甚廣。吳宓（1894—1978），字雨生、雨僧，陝西涇陽人。英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家，詩人，紅學

家。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师从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回国后即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并主编过6年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终生在大学任教。吴宓国学基础深厚，英文造诣尤高。自1922年《学衡》创刊起，直至1933年终刊，一直担任该刊总编辑，他不但“独立集稿捐资”，而且为《学衡》撰文甚多。《学衡》创办11年，在时局动荡与经费困难的内外交忧之中，能始终一贯坚持办刊宗旨与独特风格，作为总编辑吴宓的执着固韧精神与文化追求实为最主要的因素。吴宓曾以“炉火烛光依皎日”比喻自己的追求精神，自谓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期间，“听夕勤劳，至于梦中呓语，犹为职务述说辩论。盖此后三年中，实为予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见《吴宓诗集·卷末》第151、152页）

《学衡》杂志的其它编务人员还有胡先骕、汤用彤、景昌极、缪凤林等。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诗人。曾两度赴美留学，获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终生从事植物科学的研究与教学，历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从事吟咏逾四十年”的诗人。1922至1924年任《学衡》“文苑”专栏的诗歌编辑。吴宓在《空轩诗话》（1934）中说：“步曾中国诗学之知识及其作诗之造诣，皆远过于我，我深倾服，并感其指教之剴切爽直，益我良多。予虽为《学衡》杂志之总编辑，然‘诗录’一门则由步曾主持编选（予毋能改动丝毫）。步曾出洋（指1925年第二次赴美国哈佛留学—引者注），则以授邵祖平君。其后邵君与予忤，乃改请李思纯君。北来后（指吴宓1925年到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引者注）继以李汉声君。60期以后始归宓编选，外人或未能尽知也。”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清华学堂时与吴宓同学，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入东南大学，后长期在北京大学等校任哲学教授。汤用彤在东南大学期间曾任《学衡》编辑，第一篇很有学术贡献的论文即是发表在《学衡》第12期上的《评近代人之文化研究》，另发表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等译著。后以佛学史研究知名于史学界。

景昌极、缪凤林都是东南大学毕业留校的，长期在东大等校任教。1925年，吴宓北上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后，《学衡》特增设景昌极为副总编辑，负责南方地区的组稿。1927年起，改由缪凤林出任副总编辑。景氏与缪氏主要研究历史、哲学，在《学衡》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缪氏还著有《中国通史纲要》、《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此外，1930年吴宓赴欧游学期间，曾由胡稷咸一度代理编辑过第73至75三期。

三、《学衡》杂志创办始末

（1）创刊 《学衡》于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是由两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1915年，两江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1921年冬，又升格为国立东南大学。《学衡》酝酿筹办之时，正是东大欣然开创百科俱兴的发皇伸展之际。当时东大的文史地部学术研究空气颇为浓厚，历史学教授柳诒徵曾发起成立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地杂志》，开办学术讲座。文史地部学风笃实，蔚然知名于国内外，毕业生多为国内各大学聘任任教。校内各科学术带头人皆一时名素，为学界推重，文科如王澐、吴梅，历史如柳诒徵，地理如竺可桢，英语如梅光迪，教育如郑宗海等。《学衡》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空气浓厚、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教授可以源源供稿的环境里问世的，可谓得“天时、地利、人

和”之助。

当然，导致创办《学衡》杂志的根本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讨论、大碰撞及由此而产生的五四人物“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与学衡人物“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间的思想冲突。而推动《学衡》在东大问世者，厥为梅光迪。梅光迪（1889—1945），字迪生，观庄，安徽宣城人。早在《学衡》创办之前，梅光迪与胡适就在美国展开了文言与白话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论争。胡适与梅光迪都是隶籍安徽，出身清华学堂又先后留学美国的朋友，交谊甚笃。但因胡适师从杜威，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基于进化论与实用的观点，力主文学与时推移，以合世用，故以“评判的态度”对待传统，主张破旧立新，高标“文学革命”之旗帜；而梅光迪则师从白璧德，秉持白璧德的人文主义，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故虽不满中国的旧文学，却反对“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主张在现有基础上作温和的改进。胡、梅二人在美国期间的这一分歧后来带回国内，由讨论而攻驳，最后终于分道扬镳，成为对立的两面了。

1919年秋，梅光迪学成归国，始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同时又任上海《民心周报》主编。该报以“发扬吾国故有之文化”、“输入及批评欧美新思想与学说”为职志，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多有批评。1920年梅氏应故友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也曾留美）之邀，调南京高师，次年（1921年）南高升格为东南大学，梅氏即出任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年8月，梅氏的好友、同样师从白璧德的吴宓从哈佛毕业回国，应梅氏之邀，担任东大西洋文学系教授。梅光迪有了吴宓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清华哈佛同窗，顿感力量倍增。其时正值五四后期，思想文化界各种学说新见层出不穷，五四人物以西洋文化批评东洋文化，以欧化议孔教之非，决然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冲决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当时虽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竭力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东西文化”、“精神文明”、“昌明国粹”、“发扬国光”等口号，但终因缺乏强固队伍与言论阵地，难以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聚集于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及刘伯明、胡先骕、柳诒徵等人朝夕往返之际，莫不深感五四人物误以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作为人的普遍行为，以西方人的习性作为人的普遍本性，一意抛弃本国文化传统，不免矫枉过正，铸成遗憾；又鉴于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竟言西学，唯新是鹜，却不知究其本原，审慎取舍，难免“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1]，故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继绝，翰旋时运，有补于世。正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气候中，《学衡》杂志应运而生了。

（2）衍变 《学衡》创办之初，吴宓即写信给他在长沙的契友、诗人吴芳吉，要他在湖南也创办一个刊物以为响应。不久，吴芳吉与刘朴、刘永济等当年清华学堂的同学一起成立了湘君社，并创办了《湘君》文学季刊（1924年秋停刊）。《学衡》同时又与《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亚洲学术杂志》、《国学丛刊》、《华国月刊》等遥相呼应，互结奥援，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号召，一时间声势鹊起，大有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学衡》即开始受到冲击，学衡人物内部发生了分化。先是1923年11月刘伯明去世，不数日东大又发生教学大楼“口字房”遭受火灾的事变，此二事在东大引起极大震动。刘伯明（？—1923），江苏江宁人，系《学衡》筹备、初创阶段的东大副校长兼文科主任，曾以自己在东大的行政地位与学术影响给予《学衡》很大支持，《学衡》创刊

号的首篇文章（相当于发刊词）即为刘氏的《学者之精神》。刘氏去世后，柳诒徵、吴宓都有诗文记述哀忱。吴宓在挽联中写道：“（下联）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慕东林复社之规，辟警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精华，以立氓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初遽尔撒手安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重点号系引者所加）吴宓的挽联既说明了刘伯明“慕东林复社之规”在创办《学衡》“领袖群贤”中的重要作用，也透露了当年作为总编辑的吴氏在失去刘伯明有力支持后的失落感与忧虑心情。刘伯明之死是学衡人物逐渐发生变动的开始。

1924年，《学衡》中坚人物梅光迪赴美讲学，长期未归，以后也未给《学衡》写稿。梅氏的出走，无疑使《学衡》失去了一根台柱。同年暑假，总编辑吴宓也离开南京，辗转执教于沈阳东北大学及清华大学。1925年，胡先骕第二次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同年3月，东大发生“易长风潮”，柳诒徵愤而辞职也离开东大。自此，学衡人物星流云散，编辑成员分为南北两处。

（3）终刊 自学衡人物星散之后，《学衡》实际上是由吴宓一人在奋力支撑。该刊自1927年以后的停刊复刊情况，均与吴宓的活动密切相关。1927年因北伐战事，又因吴宓于年初专程赴陕接吴芳吉离开被军阀吴佩孚部将围城200多天的西安，这一年《学衡》暂时停刊。1930年9月至1931年9月，吴宓去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游学，《学衡》在1930年再度停刊，1931年仅出二期。从1931年以后，《学衡》实际上已处于艰难困顿之中，这主要在于人事与经费两项，尤其是经费，堪为《学衡》的沉重包袱。前已提及，《学衡》自创刊至终刊，所载文章均无稿酬，此即可见经费长期拮据。自67期起，曾刊有赞助经费的鸣谢，但至78期，六年间仅收到600元。按《学衡》创刊时每份二角五分，60期起改为每份三角，全年订费1.8元计算，600元只等于333份《学衡》一年的订费，经费亏损之大是可想而知了。人事方面，自总编辑吴宓北上以后，《学衡》编务始终由其在清华遥领，这种局面难免引起南京同人的不便与不满。1932年柳诒徵与缪凤林在南京创办钟山书局，提出《学衡》收归钟山书局自印发行，于是引起南北双方的最后摊牌，吴宓被迫于1933年7月在出刊第79期以后辞去总编辑之职，改由缪凤林继任。关于《学衡》终刊的这一“内部消息”，吴宓曾在《吴宓诗集·卷末》第46页中作过如下记述：“民国21年秋冬，《学衡》杂志社员在南京者，提议与中华书局解约，以本志改归南京钟山书局印行。宓当时力持反对，盖以已往十余年之经验，宓个人与中华书局，各皆变故屡经，艰苦备尝，然《学衡》迄未停刊，以昔证今，苟诸社员不加干涉，任宓独力集稿捐资，仍由中华印行，宓可使此志永永出版而不停。纵声光未大，而生命得长，任何改变办法，皆不免贪小利而损大计，故宓坚持反对云云。乃诸社员卒不谅。宓不得已，于民国22年夏，正式辞去总编辑职务。于是诸社员举缪凤林君继任，然后与中华书局解约。但迄今一年有半，尚未见《学衡》第80期出版。此事伤宓心至大。外人不明实情，反疑《学衡》之停刊由于宓之疲倦疏懒。宓既力尽智全，不能阻止，反尸其咎，乌得为平。”作为“《学衡》生命所系”的吴宓，一旦辞去总编辑之职，创办十一年之久的《学衡》杂志，也就自此终刊永别学界了。

第二部分 《学衡》内容

一、作者队伍

欲论《学衡》内容，当先分析《学衡》作者队伍。

《学衡》先后出刊79期，各期作者（“文苑”、“杂缀”、“附录”三栏不计）共108人，其中发表过三篇次以上文章者计23人。按发表作品篇次多少顺序依次为：柳诒徵（55篇次）、吴宓（42）、缪凤林（24）、景昌极（23）、王国维（20）、胡先骕（18）、张荫麟（14）、刘永济（12）、林损（12）、汤用彤（8）、郭斌和（8）、刘伯明（7）、孙德谦（7）、徐震堃（6）、梅光迪（5）、吴芳吉（4）、胡稷咸（4）、王恩洋（4）、李思纯（3）、陈柱（3）、刘朴（3）、叶玉森（3）、杨成能（3）。

从《学衡》主要作者的学历、经历、人际关系分析，可知学衡人物是有以下三方面组成的：一是留美归国者（其中又以出身清华学堂并留学哈佛者为《学衡》之中坚），这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汤用彤、张荫麟、郭斌和等。二是东南大学执教者，这有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徐震堃。三是与总编辑吴宓是清华学堂的老同学或是清华大学的新同事。前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后者有王国维、陈寅恪（留学欧美）、李思纯（留法）、胡稷咸。从以上开列的人物名单中可以看出，学衡人物中留学欧美获得高学位者多达9人，这种教育背景使他们对于西方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学衡人物中的三位年轻中坚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既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梅、胡二人早年曾得秀才功名，后又相率加入“南社”，吴宓则终身依皈“儒教”，并奉北京大学国学大家黄节为师。当他们留学哈佛时，则又不约而同从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胡先骕虽为植物学家，但他在1925年第二次赴哈佛时，也曾亲炙于白璧德）。学衡人物中的王国维是名闻中外的国学大师，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柳诒徵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与汤用彤都是清华学堂毕业赴美留学的，张氏毕生从事历史研究，汤氏对佛学史研究甚有贡献。综观《学衡》杂志主要作者的情况，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学贯中西、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其中不少人在年龄与学历方面都与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相当。由这样一支以留学欧美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中坚同时又集合了王国维、柳诒徵等对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组成的学衡人物，在对待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必然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并直接影响到《学衡》杂志的整体内容与文化精神。这种风格用梅光迪的话说就是“阐扬旧学，灌输新知”；用《学衡》的简章表达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用柳诒徵为《学衡》写的“弁言”揭示该刊出版目的则系于下列四义：“一、诵读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义。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

二、《学衡》栏目

《学衡》所设栏目，自创刊至终刊十一年一直固定不变，其内容可分为七部份：

一、插图。置于每期目录之后、正文之前，以刊登古今中外名宿大师画像为主，如第一期并列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画像。亦有介绍艺术方面的图片，如第27期为配合正文《希腊美术之特色》，特选载13幅古希腊雕塑及罗丹作品等作为插图。

二、通论。这是《学衡》的主要栏目，以发表政治时事评论与文史哲学术论文为主，如第27期《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柳诒徵）、《戒纵侈以救亡论》（杨成能）。《学衡》有关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亦多见于这一专栏。

三、述学。这也是《学衡》的主要栏目，除第38、66两期外，各期皆有。以介绍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主，尤重介绍中西学术思想，是《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具体实施。

四、文苑。专门刊登文学作品，又分为文录、诗录、词录、戏曲、小说等。以旧体诗为多，间或发表少量翻译作品。

五、杂缀。此栏不多见，内容较芜杂，有游记、诗话等。如第1至10期断续连载的胡先骕《浙江采集植物游记》，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

六、书评。此栏亦不多见。以评介新近出版物为主，尤重诗词方面的。如第1、2期连载的胡先骕《评〈尝试集〉》。

七、附录。间或有之，如第26期郭秉文的《刘伯明先生事略》等。

兹将《学衡》出刊79期发表的所有文章，按专栏别类，统计如下（各栏数字系指发表文章的篇数，诗词以首计；括号内的数字系指发表文章的篇次，如吴宓《西洋文学精要书目》连载3期，仍以一篇计，写为1<3>）：

一、通论：142（144）

二、述学：164（228）

三、文苑

- 文录 { 散文106（115）
 翻译 2
- 诗录 { 古体诗2883
 译诗 224
- 词录 338
- 戏曲 { 杂剧3
 翻译 1（2）
- 小说 { 小说3
 翻译4（12）

四、杂缀：9（22）

五、书评：24（25）

六、附录：6

三、《学衡》整体内容

从《学衡》杂志79期的整体内容考察，除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持文化守成主义或曰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一面外（参见文末附录），主要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

这方面的作者主要有柳诒徵、王国维、刘永济、张荫麟、景昌极、邵祖平等。如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华化渐被史》，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国历史之尺度》，刘永济的《中国文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纲要》；陆懋德的《中国文化

史》，张荫麟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纳兰成德传》，邵祖平的《唐诗通论》，黄建中的《中国认识论史》，景昌极的《中国心理学大纲》，袁同礼的《永乐大典考》，王焕镛的《论周代婚制》，张其昀的《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等。在大量的“国学”研究类文章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学衡》第46~72期连载的68章45万字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著）。全稿分为三编：第一编上古文化史（凡23章）。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中华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中古文化史（凡26章）。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近世文化史（凡19章）。自明季以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柳氏淹贯经史，学识广博，全稿引用资料多达600余种，自六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的论著和近代报章杂志、统计资料，无不详为搜集。作者对我国文化的起源阐明源流，尊重历史事实，不作轻率的否定或怀疑；对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创造，从社会发展、生产斗争、人民生活的需要来说明演变；对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分析得失，说明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全稿虽征引繁博，但叙事章节主题鲜明，详辨慎取，不乏独到的见解。例如，柳氏把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全部成果，归纳为史料考证之学，从而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以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的，对后学颇有启示。由于《中国文化史》对我国上下几千年文化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与考察，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促进的作用，因而全稿在《学衡》发表后，即引起较大的反响。钱穆称誉此书为“名世之作”，认为柳氏的史学成就堪与陈寅恪分庭抗礼。《学衡》刚刊完全稿，即有书商偷印出版，但因鲁鱼亥豕，使《学衡》不得不发表启事，声明版权所有。《中国文化史》于1932、1947年两度出版，1988年又作为“中国学术丛书”之一，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重版。由此可见此书的价值与影响，亦可窥见《学衡》杂志对于研讨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

应当指出，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方面，《学衡》的努力在当时学界是独树一帜的，它所刊布的不少文章，至今仍有参考意义。例如，王国维在古代史、金石考古、边疆史地等方面的论述，汤用彤对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史的钻研，刘永济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轨迹的探讨等。有的文章在发表当时就传诵一时，除《中国文化史》外，其它如刘永济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为时人所重。张荫麟在《学衡》二十一期刊载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以深刻的史识，批评梁启超有关老子的考证，引起任公的注重与赞赏。

第二、引介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

在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之际，《学衡》又致力于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引介。他们认为“引介西学”和“昌明国粹”应是文化研究的两翼，相辅而行。真正的西方文化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本土文化的价值，更能与传统文化彼此贯通，融铸成一种世界性的新文化。热衷于引介西学的主要是留学归来的一批年轻学者，如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张荫麟、汤用彤、郭斌和等。在《学衡》79期“通论”、“述学”两栏中，有关讨论西方文化的文论多达69篇，其内容又可分为以下数端：

（1）注重古希腊罗马文化

双希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学衡人物在对待双希文化方面格外注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吴宓说过，他“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必看明(1)希腊哲学(2)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两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2]但“西洋文明之精华，惟在希腊之文章哲理艺术。”^[3]又说：“古希腊之哲理文章艺术等，为西洋文化之中坚，源流所溯，菁华所在，为吾国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应注重者。”^[4]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衡》十分注重希腊文化的译介，这方面的著译多达17种（篇），其中重要的有：景昌极、郭斌和合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辨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话篇》、《斐德罗篇》），在《学衡》连载后由郭氏撰写导言单独出版，开我国译介柏拉图著作之先河；向达、夏崇璞合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全书，分期连载，亦开汉译亚里士多德著作之先声。其它如汤用彤译《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胡稷咸译《希腊之哲学》等，以及吴宓著《希腊文学史》等，均是《学衡》介绍希腊文化的实绩。

（2）介绍新人文主义

《学衡》总编辑吴宓及梅光迪、胡先骕均深受美国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受今日西方最高之理想者”必须了解新人文主义，^[5]而“实证之人文主义，如本志夙所提倡介绍之白璧德等人之学说是也。”^[6]故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引介自然成了《学衡》引介西学的一大重要内容与特色，属于这方面的文章多达20篇。总编辑吴宓还在各篇译著之前撰写长篇按语，详尽阐述新人文主义。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吴宓译《白璧德之人文主义》（19期）、《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32期）、《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38期）、《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72期）、《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72期），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3期），徐震堉译《柯克斯论古学之精神》（21期），张荫麟译《葛兰坚论学校与教育》（42期）、《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74期），浦江清译《薛尔曼现代文学序论》（57期），以及梅光迪写的《现今西洋人文主义》（8期）、《安诺德之文化论》（14期）等。

（3）介绍西方文学

介绍西方文学为《学衡》引介西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从创刊至终刊一直坚持不懈。先后引介的西方作家有但丁（Dante）、兰姆（C.Lamb）、雨果（V.Hugo）、安诺德（M.Aronld）、爱伦坡（ALLEN Poe）、雪莱（Shelley）、罗色蒂（Rossetti）、济慈（Keats）、歌德（Goethe）、拜伦（Byron）、莎士比亚（Shakespeare）、萨克雷（Thackeray）、伏尔泰（Voltaire）等。《学衡》除单个作家的研究介绍外，还通过组织专栏，集中介绍欧美文坛的重要信息，如第65期（1928.9）曾推出一组《1928年西洋文学名人纪念汇编》，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一年去世的一些世界著名作家或作家的生辰纪念，计有：英国小说家哈代、西班牙小说家易班乃士逝世，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法国历史学家与批评家但恩、英国小说家麦雷透斯、英国诗人但丁·罗色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等等。

在诸多介绍西方文学的译著者中，以吴宓作品最富。《学衡》创刊的第一年，他就发表了《西洋文学精要书目》，分载数期，第二年又发表《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22期），通过介绍西方文学重要作家作品与必读参考书籍，用以引导初学者入学门径。《学衡》发表

的译作，吴宓大多写有长篇按语，详介作者生平、文学成就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吴宓在《学衡》还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如《诗学总论》、《英诗浅释》等。1928年至1933年，他在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期间，也殚竭心力，利用副刊鼓吹介绍西方文学，发表过《评潘彼得译本附论桓吉尔》、《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等文。

第三、进行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

学衡人物十分重视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学衡》“弁言”确定“诵读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为其办刊要旨，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研讨中西文化的“精言”、“共性”，“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方文化决不一概盲从，而应在“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的基础上“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7]《学衡》的办刊主旨既是学衡人物进行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目的与指归，也是他们从事这一工作的理论纲领与努力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79期自始至终就是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寻找出一种既合乎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当然，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否合乎中国国情、顺乎世界潮流达到预期目的那是另一回事，但他们的的确确在进行着严肃认真的中西文化的比较研讨。属于这方面的课题是多方面的；这里略述数项：

(1)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比较

《学衡》创刊号之插图并列孔子与苏格拉底中西两大哲人的画像，此即表明学衡有志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趋向。《学衡》十分重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前已述及），他们认为这三位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哲人孔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吴宓在《我之人生观》[8]中说：“吾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义，求之于泰西，得柏拉图。柏拉图之时势与怀抱，与孔孟最相近似。”他在《苏格拉底像赞》[9]中更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直接表明了学衡人物寻求中西文化会通的苦心：

亶亶苏哲，奋志求真，明法殉道，杀身成仁。

天地正气，日月精魂，音容宛在，光焰长存。

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极，一体同尊。

举世横逆，吾独辛勤，内省不疚，常视斯人。

胡稷咸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其（希腊）文明之性质与中国之文明，颇相仿佛。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所研究之主要问题，厥为人类道德之增进，与我国孔孟讨论相同。……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中，亦以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目的。而其所谓中道，又与孔子中庸之道相吻合……与孔孟同主张人本主义。”学衡人物之所以孜孜于孔子、苏格拉底等的比较，得出东西哲人“一体同尊”的结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倡导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与西方古典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一致性与永久的文化价值。而这些观点都是深受白璧德的影响所致。白璧德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为向往，尤其敬仰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他认为东西方人文主义者的精神是一致的，故“凡能接受人文主义的纪律的，必趋于成为孔子所谓的君子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持身端严的人。”他“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个新儒家运动，以扬弃儒家思想里千百年来累积的学院与形式主义的因素为特质的新儒家思想，予以响应。”

(2)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学衡人物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10]他们认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枝节琐屑的儒家典章仪文，而是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化精萃，也即如巴勒斯（Bares）所言“不是过去，而是永恒的事物”。贺吕群在《哭梅迪生先生》一文中，对此作了如下表述：“……一种影响于后世几百千年的思想或学说，其本身必含有两个不可分的成分。一是属于时代的……另一个成分是超时代的，那是总集一种文化之大成而带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才能影响于后世，息息与整个历史文化相关。……学衡社所欲发扬的那是超时代的部分，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终古常新，虽打而不能倒。”贺氏所谓的具有超时代意义的文化精神，即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这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于世界的根本之点。对此，柳诒徵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11]中作过详尽探讨。柳氏以为“西方立国以宗教，震旦立国以人伦”，虽然“吾国初民，亦信多神”，但“脱离宗教甚早，建立人伦道德，以为立国中心，绵绵数千年，皆不外此。此吾国独异于他国者也。”非宗教性也即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否定神鬼的权威，强调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中心。它“不使人类为经济之奴隶”，“不讲超人之境”，不象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那样，一旦个人私欲不能满足，“则惟宗教为依皈，不求之上帝，则求之佛国，欲脱人世而入于超人之境，而于人之本位，漠然不知其定义及真乐。”柳氏断言：“吾国文化惟在人伦道德，其它皆此中心之附属物。……故吾国之学，不讲超人之境，而所悬以为人之标准者，最平易，亦最艰难。……中国文化可持以西被者在此；中国文化在今日之世界具有研究价值者亦在此。”

(3) 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

前已述及，吴宓、梅光迪曾师从美国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白璧德除了倡导人文主义外，更是一位比较文学研究家，他从1894年起即在哈佛大学执教比较文学等课，直至去世，这给吴宓以很大影响。1922年，吴宓任教东南大学，即讲授“中西诗之比较”，开我国比较文学之先河。30年代初，出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继续开设“中西诗之比较”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英国浪漫诗人”等课程。吴宓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比较文学论文，重要者有：《诗学总论》、《希腊文学史》、《英诗浅释》等。《诗学总论》一文长达数万言，将中西诗歌艺术特色互为参照比较，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如在诗歌的音律方面，吴宓认为：“（一）希腊拉丁诗之音律，以长音及短音之部分，相重相间而成（物理学上无关系）。（二）英国诗之音律，以重读及轻读之部分，相重相间而成；以音波幅之宽狭定之。（三）吾国诗之音律，以仄（高）声及平（低）声字相重相间而成；以音波振动数之多寡定之。”吴宓在《希腊文学史》中，专列《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之比较》一节，他认为荷马史诗与中国弹词最相近似，列举了十二个方面的契合点，主要有：两者的内容同为“英雄儿女”，即战争与爱情；同为无名氏之作，最初均无定本，常由盲者四处演出，都用一种简单的乐器伴奏；表现形式都是以叙述故事为主。吴宓还就古希腊的教训诗与中国古代教训诗之间的异同作了比较。吴宓在1922年重刊于《学衡》第4期的《论新文化运动》（首刊于1920年《留美学生季刊》第8卷第1号）传达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观点：“近者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章每字之来源，今古及并世作

（下转第82页）

文王也。武王之武，继述文王，而武之烈，以无竟矣。偃武修文，睿定尔功！《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睿定尔功。”《武》凡六成，此其一终焉。

《酌》愚按一作沟。与《赉》《般》一体，盖亦《大武》篇中之一章者也。

《桓》《左传》宣十二年，楚庄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是《桓颂》为《大武》乐章六成也。明其应天而兴，选贤共治也。

《赉》《左传》宣十二年，楚子引“辅时绎思，我祖维求定”。为《大武》三章，是《赉》为《大武》乐章三成也。

《般》：《大武》乐章四成也。《三家诗》章末：“时周之命”句下有“於绎思”三字。与《赉颂》章末同，因知其为《大武》之四成也。

《鲁颂》四篇。

愚按，凡颂皆宗庙祭祀之乐，告成功，美盛德之辞。诸侯庙祭未曾无乐，不得有颂，盖亦无专美之义也。《鲁颂》四篇，皆颂美其君之辞，然非庙祭之乐。因知僖公以前固未有也。惟鲁之有颂：《礼记·明堂》位篇云：“所以康周公也”。谓成王赐之，伯禽受之。

《商颂》五篇，皆为庙祀之乐。其辞皆典古朴茂。未知作于何人。然大手笔也。《那》《烈祖》二篇，尤为古朴，乃祀成汤之乐，盖商盛时之诗矣。《玄鸟》篇，称及武丁，是作于高宗以后也。《长发》盖大桀之诗。《殷武》用祀高宗，为高宗立百世不迁之庙，则当已在帝乙之世矣。

+++++
(上接第132页)

者互受之影响，考据日以精详。”他认为胡适首倡的“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自由诗 (Free Verse)；而美国此种诗体，则系学法国三四十年前之象征派 (Symbolists)。”当白话诗刚在五四文坛出现之际，吴宓即对其来源影响作出比较判断，这在当时可谓别具只眼，自倡新声。

综观《学衡》杂志的整体内容，笔者认为该刊是现代中国一份内容庞杂但又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精神与理想追求的重要的文化研究刊物。对于它的方方面面，还需要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科学求实的探研。笔者的这一拙文只是抛砖引玉，至于具体精深的研究，尚“望垦辟于健者也”。

〔作者附记：本文系为“吴宓先生诞辰96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本文旨在对吴宓先生主编之《学衡》杂志办刊始末与整体面貌作一史实性的考察。因限于篇幅，有关《学衡》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持文化守成主义的情况，笔者将撰文另述，此非本文勿视《学衡》杂志这一重要现象也。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注

〔1〕〔7〕〔10〕《学衡》杂志简章。

〔2〕吴宓《空轩诗话·二十四》。

〔3〕吴宓《沃姆中国教育谈》识语。

〔4〕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译者识语。

〔5〕吴宓《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译序。

〔6〕吴宓《张荫麟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编者序。

〔8〕〔9〕〔11〕《学衡》16、48、27期。

责任编辑 任晖